

母公司无形资产能提升海外子公司绩效吗

——基于技术距离和知识产权保护差异的双重视角

石丽静¹, 洪俊杰²

(1. 天津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222;

2.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本文采用 2010—2022 年中国上市企业海外子公司经营数据, 考察了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以及技术距离和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当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低于中国时, 技术距离扩大会降低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 当东道国的技术水平高于中国时, 技术绝对距离扩大会增强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 母国和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会抑制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 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在东道国属于创新核心国和数字技术资源丰富的国家样本中更为明显。

关键词: 无形资产; 跨国企业; 海外子公司绩效; 技术距离; 知识产权保护

[中图分类号] F2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034(2025)05-0096-19

引 言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近期, 中国再次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在此背景下, 中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促使双向投资协调发展。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实践主体, 跨国企业对于全球范围内配置优质生产资源、加强国内外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

[收稿日期] 2024-12-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技术驱动制造业创新链韧性提升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3BJY217)

[作者简介] 石丽静(1987—), 女, 河北邢台人,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国际投资与创新管理; (通讯作者) 洪俊杰(1976—), 男, 安徽黄山人, 山东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国际投资与创新管理

近年来,中国跨国企业深入广泛地拓展海外市场,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根据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24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1个国家和地区的940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额达10244.5亿元人民币,增长11.7%^①。虽然中国企业加速进行海外扩张,但是其海外盈利能力仍有待提升。根据2025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130家上榜公司2024年平均销售收入约为820亿美元,上榜美国企业的年平均销售收入约为1058亿美元;中国124家上榜公司^②2024年平均利润约为42亿美元,上榜美国企业年平均利润约为97亿美元,全榜单500家企业的年平均利润约为59亿美元^③。除了“薄盈利”外,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经营活动还受到投资合法性、外来者劣势及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影响。海外子公司运营情况不仅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成败,还涉及海外投资的可持续性。因此,如何提高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推动其高水平“走出去”,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无形资产,是企业内部持有的技术、专有知识、知识产权(如专利、商标)、技术路线图、生产工艺以及公司的关系和声誉等资产或资源(Nelson和Winter, 2002),具有独特性、无形性、专有性和可转移性。它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关键生产要素通过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创造价值,还可以与数字技术紧密结合,驱动全球价值链的创新升级。数字经济时代,以无形资产为核心的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价值体现在专利、技术、品牌、渠道等无形资产上。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无形资产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体现,母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不仅有助于增强海外子公司的技术创新优势,提升企业的生产力,为海外子公司创造价值,还有助于拓宽不同地区的消费需求,加速品牌的全球扩张,使海外子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发挥出比较优势。中国跨国企业如何利用无形资产提升海外投资绩效,实现高水平“走出去”,显得越发重要。

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包括前期关于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投资广度和投资速度等决策,还包括投资后的海外子公司运营绩效的评估。已有研究主要讨论跨国企业前期的海外投资决策活动,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宏观层面包括东道国制度环境(郑磊和吕美静, 2022; Konara和Shirodkar, 2018)、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距离(王碧珩和高恺琳, 2023)、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耿伟等, 2021)、东道国的移民网络(赵晓阳和衣长军, 2024)、东道国社会信任多样性(衣长军等, 2024)等因素;微观层面则包括高管海外背景(衣长军等, 2022)、母公司数字化转型(赵晓阳等, 2024)、技术创新能力等因素。

①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 http://sg.mofcom.gov.cn/sxtz/zgyshj/art/2025/art_733c103e093d4ee8ad6c1fe31f6568be.html (访问日期2025-03-03)。

②此数据只包括内地和香港公司。

③资料来源:财富中文网, https://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25-07/27/content_467206.htm (访问日期2025-08-13)。

关于无形资产与海外子公司绩效方面,已有研究虽然关注到无形资产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运营的重要作用(Buckley 和 Casson, 2009; Dunning, 2001; Contractor 等, 2016),但主要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很少聚焦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与传统跨国公司相比,新兴经济体企业缺乏强大的企业特有优势,国际化进程中在技术创新和知识整合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企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母公司无形资产增加能否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需要进一步检验和论证。

关于技术距离、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司绩效方面,已有研究认为前沿技术距离是影响国家战略决策和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技术距离会通过影响国家决策和国家战略来影响国家经济增长,技术距离过大将加大国家间交流难度,不利于技术扩散和国际贸易(傅帅雄和罗来军, 2017)。另一方面,与前沿技术距离过大,会阻碍企业对知识和技术的吸收,抑制技术溢出和企业的创新活动(陈怡安, 2014),不利于发挥国外技术引进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张杰等, 2020)。开放经济下,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不仅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区位选择(蒋殿春和彭大地, 2023),也会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欧忠辉等, 2024)、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余骁等, 2023)产生影响。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培育、巩固和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优势,保障海外技术资产的垄断收益与市场价值,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企业创新回报和财务绩效(沈国兵和黄铄珺, 2019; 吴超鹏和唐菡, 2016)。可见,技术距离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于知识技术溢出、扩散和创新吸收能力的提升非常重要。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关于专利、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的转移、溢出、适应和吸收,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母国和东道国的技术距离和知识产权保护差异的影响。虽然已有研究考察了技术距离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技术溢出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但是从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技术距离和知识产权保护差异的视角来考察母公司无形资产与海外子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还缺乏系统性的讨论和评估。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对象方面。以往研究主要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来考察无形资产对跨国公司运营的战略价值,本文则以快速崛起的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作为样本,考察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经营的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新的经验证据。第二,研究视角方面。已有文献主要考察了技术距离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技术溢出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本文则从母国与东道国的技术距离和知识产权保护差异两个维度,探究其在母公司无形资产和海外子公司绩效中的调节机制,从而丰富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三,影响效应异质性方面。本文借助海量的上市公司海外投资经营数据,从东道国在全球创新体系的层级和数字技术水平两个方面展开异质性分析,更深入地挖掘母公司无形资产提升海外子公司绩效的约束条件。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母公司无形资产与海外子公司绩效

知识经济背景下,无形资产作为技术创新的载体,体现了知识从量到质的升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隐性资源。无形资产主要分为生产型无形资产和营销型无形资产,前者包括专利、专有技术、技术诀窍等,其主要通过风险大、花费高的研发活动创造出来;后者与营销活动密切相关,包括商标、商号、公司声誉、客户名单、客户关系、销售队伍和提供服务的能力等,有助于开发产品或服务的商业价值(于品显,2023)。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无形资产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不仅构成企业的特定优势,还成为企业高质量稳健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郜志雄,2024)。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讨论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

首先,母公司拥有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诀窍等生产型无形资产,增强海外子公司的技术创新优势,推动海外子公司对母公司的独特技术资源进行知识整合和学习,增强自身创新能力和垄断优势,进而提升海外子公司绩效。根据内部化理论,与外部市场相比,企业积累的特有能力和经验,在企业内部网络中更容易进行转移、共享并创造价值(Delios 和 Beamish, 2001)。无形资产作为企业重要的隐形资源,具有嵌入性和专有性,并在公司内部具有可转移性。当前,在资本、劳动力和其他投入要素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具有无形资产优势的母公司有能力将自身优势资源转移到海外子公司,为海外子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资源基础,并为其带来独特的技术垄断优势(柴宇曦等,2021),使得海外子公司在和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并逐步扩大海外市场盈利和规模。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还可以将母公司无形资产与自身有形资产相结合,扩大海外业务范围,获取超额收益,构建自身的可持续竞争优势(胡川和王子豪,2024),弥补其在东道国市场面临的外来者劣势(缺乏东道国当地的市场和营销知识等),增强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风险抵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Contractor 等,2016)。此外,母公司在全球申请的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还可以有效打击和震慑竞争对手的侵权行为,确保海外子公司的技术竞争优势,降低运营风险,为海外子公司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推动海外子公司财务绩效的提升。

其次,母公司拥有的品牌、商誉、销售团队等营销型无形资产,通过提升海外子公司的产品形象和品牌声誉,增强抵御外部不确定性的风险韧劲,进而提高海外子公司的市场份额和价值。无形资产已经越来越成为企业在跨国商业活动中的核心竞争优势(Uddin 等,2022)。具体而言,母公司拥有的品牌、商誉等无形资产,能够为海外子公司在消费者中树立良好的产品形象和企业形象,丰富其在东道国市场的营销策略和手段,加大产品的宣传和推广,拓展客户资源,提高海外市场份额,进而提升海外子公司绩效。此外,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通常面临外来者劣势、竞争对手等未知风险,母公司拥有的品牌、商誉等无形资产,有助于提升东道国消费者和合作伙伴对海外子公司的品牌认可度和信任度,通过品牌与信息传递效应(苑泽明等,2023),获取政府和银行等机构的关注和投(融)资支持,缓解海外子公司在

东道国面临的融资约束,推动海外子公司克服市场准入壁垒,加快市场渗透,提高子公司的经营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说 1 母公司无形资产的增加有助于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

(二)母公司无形资产、技术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绩效

随着国际化扩张,很多跨国公司通常会在全球建立多家海外子公司或者分支机构,尽管这些海外子公司都能接触到母公司的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资源,但不同海外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却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与母国和东道国的技术距离有关。技术和创新知识的转移效果,不仅和转移方的技术能力有关,还取决于接收方人员的知识吸收能力(Berry 等, 2010)。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大多数技术和管理人才主要来自东道国本土,而这些人才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水平主要取决于东道国市场的技术发展水平。东道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不同,母国和东道国的技术距离随之也将存在明显差异。

技术距离具有方向性,当技术距离为正值时,即母国技术水平高于东道国技术水平时,技术距离越大,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沟通协调难度以及海外子公司对母公司先进技术资源的适应和应用难度将增大,进而使得母公司将无形资产转移到海外子公司的意愿降低,海外子公司从母公司无形资产中获取价值的难度增大,抑制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例如,技术水平差异越大,子公司对于先进技术知识的理解和适应能力越弱,跨国公司母公司人员将自身的技术知识传授和讲解给海外子公司相关人员时,会变得更加困难(Jensen 和 Szulanski, 2004),不利于发挥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

当技术距离为负值时,即母国技术水平低于东道国技术水平时,技术绝对距离越大,意味着海外子公司所在的东道国的技术水平越高,东道国的技术环境相对母国更加完善,母公司将先进技术资源转移到海外子公司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将更低。特别是海外子公司对母公司先进技术的适应和应用难度降低,母公司和海外子公司人员关于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沟通更为顺畅,有助于增强母公司将无形资产转移到海外子公司的意愿。海外子公司也可以结合从东道国当地获取的新技术研发能力对母公司转移的无形资产进行开发利用并从中获取价值(Luo 和 Tung, 2007),从而增强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

尽管如此,若从海外子公司的竞争优势构建来看,也可能得到相反假设。当技术距离为正值时,即母国技术水平高于东道国技术水平时,如果东道国的本土市场竞争程度不高,技术距离越大,那么母公司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诀窍等生产型无形资产在东道国的新颖性和价值性也将越大。这也更容易构建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技术竞争优势,从而增强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反之,当东道国技术水平较高时,技术绝对距离越大,母公司的生产型无形资产在东道国的新颖性和价值性将变得越低,海外子公司反而不易借助母公司的无形资产来构建自身在东道国的技术竞争优势,从而削弱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技术距离对于母公司无形资产和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中的调节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因而提出:

假说 2a 当母国技术水平高于东道国技术水平时,技术距离扩大会抑制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当母国技术水平低于东道国技术水平时,技术绝对距离扩大会增强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

假说 2b 当母国技术水平高于东道国技术水平时,技术距离扩大会增强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当母国技术水平低于东道国技术水平时,技术绝对距离扩大会削弱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

(三) 母公司无形资产、知识产权保护差异与海外子公司绩效

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对于专利、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的转移和溢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母国和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差异,反映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接近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差异越小,说明母国和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接近,意味着技术跨国转移时面临的不确定性越低、风险越小,母公司向海外子公司转移专有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意愿和信心将增强,有助于海外子公司从母公司的无形资产中获取更多的技术资源和创新溢出,进而提高自身的经营绩效。

母国和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越大,存在两种情况:第一,母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小于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差异越大,意味着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强,跨国公司往往会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地区,从事高附加值的活动,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的价值将大大降低,不利于发挥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第二,母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高于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差异越大,意味着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弱,技术泄露或技术溢出的风险越高。这不仅会降低母公司将自身无形资产转移到海外子公司的意愿,还会降低无形资产的回报率(Zhao, 2006),抑制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特别是当跨国公司存在多个海外子公司时,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弱,位于该东道国的海外子公司从事技术密集型工作的概率越低。在跨国公司的整体运营规划中,该海外子公司将更多地承担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业务。这些低端业务虽然会增加跨国公司的整体价值,但却不利于海外子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说 3 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在母公司无形资产和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关系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即母国和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越大,越会抑制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将中国上市企业的海外子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匹配和整理 CSMAR 上市公司数据库、BVD-OSIRIS 数据库、BVD-ORBIS 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①,得

^①CSMAR 上市公司数据库, <https://data.csmar.com/> (访问日期 2024-05-18); BVD-OSIRIS 数据库, <https://orbis.bvdinfo.com/ip> (访问日期 2024-05-22); BVD-ORBIS 数据库, <https://osiris.bvdinfo.com/ip> (访问日期 2024-05-24);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访问日期 2024-06-19)。

到 2010—2022 年中国上市跨国公司分布在全球不同国家的海外子公司数据。在此基础上,本文剔除 ST 和 *ST 企业、存在极端值与关键数据缺失以及投资地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百慕大、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的样本,最终得到 2010—2022 年中国 791 家上市跨国公司 2 368 个海外子公司的 6 595 条观测数据。样本企业的东道国分散在全球 70 个国家,分布数量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英国、荷兰、马来西亚、印度、意大利、日本和巴西。

(二) 模型设定与变量测度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为了检验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以及技术距离和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设定模型如下:

$$Profit_{ijt} = \beta_0 + \beta_1 Intangibles_{it} + \beta_2 Control_firm_{ijt} + \beta_3 Control_country_{jt} + \gamma_j + \delta_k + \thet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1)$$

$$Profit_{ijt} = \beta_0 + \beta_1 Intangibles_{it} + \beta_2 M_{jt} + \beta_3 Intangibles_{it} \times M_{jt} + \beta_4 Control_firm_{ijt} + \beta_5 Control_country_{jt} + \gamma_j + \delta_k + \thet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2)$$

式(1)和式(2)中,下标 i 、 j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国家和年份, $Control_firm_{ijt}$ 代表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Control_country_{jt}$ 代表国家层面控制变量, γ_j 、 δ_k 和 θ_t 分别表示国家、行业 and 年份固定效应, ε_{ijt} 为随机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为海外子公司绩效 ($Profit_{ijt}$)。采用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息税前利润率来衡量,反映企业在支付利息和所得税之前的盈利能力。

核心解释变量为母公司的无形资产 ($Intangibles_{it}$)。采用母公司财务报表中披露的无形资产取自然对数衡量。

调节变量 M_{jt} 有两个,分别是中国 and 东道国的技术距离 ($Tech_dist$) 和知识产权保护差异 (IPR_diff)。一国的技术能力通常用专利作为代理变量来测度 (Berry 等, 2010), 本文用一国的每百万居民的平均专利申请数来衡量。技术距离则用中国的居民专利申请数/中国的人口数 (百万) - 东道国的居民专利申请数/东道国的人口数 (百万) 来表示,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知识产权保护差异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 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取平方后再开根号,值越大,表示两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越大,值越小,表示两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接近。

控制变量包括企业 and 国家两个层面。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子公司规模 ($Size_affiliate$)、子公司年龄 ($Age_affiliate$)、子公司偿债能力 ($Solvency_affiliate$)、母公司年龄 (Age_parent) 和母公司成长性 ($Growth_parent$)。其中,子公司规模用海外子公司的总资产加 1 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母公司成长性用母公司的总资产增长率来衡量。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Gdp_per_capita)、市场潜力 (Gdp_grow)、制度质量 ($Institution$) 以及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 (CD)。其中,东道国制度质量用东道国国家治理指数六个维度的加权平均值来测度。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回归结果见表 1。其中, 列(1)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母公司无形资产, 并控制国家、行业 and 年份固定效应, 在此基础上, 列(2)包含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列(3)进一步加入国家层面控制变量, 同时控制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列(4)则仅控制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 列(5)则同时控制年份、国家和行业固定效应。列(5)中 *Intangibles* 的系数为 0.448, 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母公司无形资产能显著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母公司丰富的无形资产资源, 不仅能为海外子公司带来先进的技术竞争优势, 还可以通过品牌和信息传递效应, 提升海外子公司的产品形象和品牌声誉, 缓解融资约束, 降低海外子公司的外来者劣势, 进而提高海外子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经营绩效, 假说 1 得到验证。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5)
<i>Intangibles</i>	0.649 *** (0.190)	0.434 ** (0.204)	0.555 *** (0.215)	0.834 *** (0.191)	0.448 ** (0.225)
<i>Solvency_affiliate</i>	—	0.137 *** (0.012)	0.137 *** (0.013)	0.148 *** (0.012)	0.130 *** (0.013)
<i>Size_affiliate</i>	—	0.596 ** (0.254)	0.228 (0.251)	0.344 * (0.189)	0.321 (0.278)
<i>Age_affiliate</i>	—	0.093 *** (0.024)	0.092 *** (0.024)	0.037 ** (0.018)	0.097 *** (0.025)
<i>Age_parent</i>	—	-0.242 *** (0.082)	-0.289 *** (0.076)	-0.246 *** (0.067)	-0.270 *** (0.085)
<i>Growth_parent</i>	—	0.009 (0.009)	0.014 (0.009)	0.010 (0.009)	0.012 (0.008)
<i>CD</i>	—	—	0.931 * (0.524)	-5.111 (4.406)	-15.345 *** (5.066)
<i>Gdp_per_capita</i>	—	—	-1.106 (1.084)	8.797 (6.396)	7.608 (5.925)
<i>Gdp_grow</i>	—	—	-0.177 (0.149)	-0.114 (0.174)	-0.067 (0.156)
<i>Institution</i>	—	—	-2.069 ** (0.928)	2.959 (5.413)	7.901 (4.885)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是
常数项	49.240 *** (11.024)	12.349 (15.074)	12.749 (12.024)	-101.515 (67.259)	17.382 (66.588)
观测值	5 162	4 712	4 302	4 417	4 302
R ²	0.213	0.264	0.243	0.099	0.273

注: *、** 和 *** 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 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技术距离和知识产权保护差异的调节效应

表 2 汇报了技术距离和知识产权保护差异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由列(4)可知,技术距离与母公司无形资产的交互项系数为-0.096,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当技术距离为正时,即中国的技术水平高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时,技术距离扩大会削弱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当技术距离为负时,即中国的技术水平低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时,技术绝对距离扩大则会增强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假说 2a 得以验证。根据吸收能力理论,跨国公司知识转移和知识溢出效果会受到吸收能力的影响(Argote 和 Miron-Spektor, 2011)。东道国的技术发展会通过影响当地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特别是海外子公司中来自当地的技术管理人才的知识水平,进而影响到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吸收能力。而技术距离正是吸收能力强弱的一种体现(陈涛涛,2003),当东道国的技术水平高于中国时,技术绝对距离越大,位于东道国的海外子公司的吸收能力越强,更能有效发挥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的赋能效应。反之,当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低于中国时,技术距离过大则会削弱海外子公司的吸收能力,不利于发挥母公司无形资产的转移效果。

由表 2 列(4)可知,知识产权保护差异与母公司无形资产的交互项系数为-1.451,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弱化了母公司无形资产对

表 2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i>Intangibles</i>	0.448 ** (0.225)	0.694 *** (0.254)	1.635 *** (0.488)	2.427 *** (0.629)
<i>Tech_dist</i>	—	1.168 (0.898)	—	3.426 ** (1.648)
<i>IPR_diff</i>	—	—	13.776 *** (4.964)	17.709 *** (5.590)
<i>Intangibles</i> × <i>Tech_dist</i>	—	-0.054 * (0.028)	—	-0.096 ** (0.039)
<i>Intangibles</i> × <i>IPR_diff</i>	—	—	-1.092 *** (0.405)	-1.451 *** (0.47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7.382 (66.588)	-122.968 * (68.195)	-124.072 (95.877)	-219.548 ** (94.051)
观测值	4 302	3 756	2 675	2 638
R ²	0.273	0.287	0.334	0.337

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正面影响，即中国和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越大，越不利于发挥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假说 3 得以验证。由此可见，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需注重母国和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同频性（欧忠辉等，2024）。尽管母公司无形资产能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但在无形资产等知识资源转移过程中潜在的风险仍然不可被忽视。母国和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接近，意味着母公司无形资产等知识转移过程中面临的经营风险和交易成本将更低，越能发挥知识转移的效果，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分别将被解释变量海外子公司绩效替换为毛利润率，将核心解释变量母公司无形资产替换为母公司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将所有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后重新回归，结果见表 3。列(1)至列(3)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此外，采用二元回归模型，将被解释变量海外子公司绩效替换为二元变量 *Profit_binary*，如果利润率大于 0，则 *Profit_binary* 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然后采用 probit 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列(4)汇报了 probit 模型回归的边际效应，*Intangibles* 的系数为 0.012，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

项目	(1)	(2)	(3)	(4)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缩尾	替换模型
<i>Intangibles</i>	1.444 *** (0.308)	—	0.417 * (0.229)	0.012 *** (0.003)
<i>Intangibles_IV</i>	—	—	—	—
<i>Intangibles_ratio</i>	—	22.552 *** (6.280)	—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 367	3 367	4 302	5 879
R ²	0.601	0.600	0.278	—
Pseudo R ²	—	—	—	0.209

(四) 内生性分析

1. 工具变量法

尽管实证中尽可能控制企业层面变量，但是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可能同时会受到某种需求冲击。这可能会使原有的关于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

效的影响的解释存在偏误。另外，海外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可能会对母公司的无形资产存在反作用。为了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赵晓阳等(2024)的做法，采用同行业同地区的上市公司无形资产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一方面，上市公司无形资产与所在行业、地区的无形资产密切相关，满足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行业和地区的无形资产与某一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和经营绩效不存在直接关系，满足外生性条件。表4汇报了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工具变量回归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Intangibles_IV* 估计系数为 0.960，在 1%的水平上显著，结合弱工具检验和可识别检验的结果，工具变量的选取是符合标准的。列(2)为工具变量回归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Intangibles* 的系数为 0.649，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考虑内生性后，母公司无形资产依然能显著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进一步验证前文结果的稳健性，即母公司无形资产的增加有助于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

表 4 内生性处理

项目	工具变量法		样本选择问题	
	(1)	(2)	(3)	(4)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i>Intangibles</i>	<i>Profit</i>	<i>Ofdi</i>	<i>Profit</i>
<i>Intangibles</i>	—	0.649 *** (0.241)	—	0.591 ** (0.293)
<i>Intangibles_IV</i>	0.960 *** (0.009)	—	—	—
<i>Procedure</i>	—	—	-0.335 ** (0.017)	—
<i>Imr</i>	—	—	—	-0.637 (5.857)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666.512 <0.000>	—	—	—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1.4e+04 [16.38]	—	—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 302	4 302	3 377	2 318
R ²	0.911	0.273	—	0.270
Pseudo R ²	—	—	0.231	—

注：<>内为 P 值，[]内为 Stock-Yogo 弱检验识别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2. 样本选择问题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如果影响海外子公司绩效的不可观测因素与母公司选择的投资目的地具有较强相关性,那么可能存在样本选择问题。为此,本文借鉴王碧珩和高恺琳(2023)、衣长军和赵晓阳(2024)的做法,采用 Heckman 选择模型,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进行处理。第一阶段加入东道国成立企业所需的手续个数的对数值(*Procedure*)作为影响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但对企业后续经营绩效无持续影响的额外变量,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mr*)。其中,东道国成立企业所需的手续个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然后将 *Imr* 放入第二阶段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列(3)和列(4)。可以看出,*Imr*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并不严重。综上,在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后,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结果比较稳健。

(五)异质性分析

1. 东道国^①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层级差异

根据世界体系理论,一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所处的层级不同,其能够接收的知识技术溢出也不同(Nordensvard等,2018)。东道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层级差异,可能会影响到跨国公司对跨境专利、知识等无形资产转移和溢出效果。为了进一步讨论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是否会因为东道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层级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借鉴司月芳等(2020)做法,根据东道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位置分为核心国家和非核心国家。其中,核心国家包括第一层级的美国、日本,第二层级的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瑞典、荷兰、意大利、芬兰、韩国、中国(包括台湾地区)、澳大利亚、以色列,以及加拿大,其余为非核心国家。核心国家之间知识流动通道相对通畅,知识互动和创新活动更为频繁。

表5是东道国为全球创新体系核心国与非核心国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列(1)为核心国,*Intangibles* 的系数为0.603,在10%的水平上显著,列(2)为非核心国,*Intangibles* 中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母公司无形资产能显著提升位于创新核心国的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而对位于创新非核心国的海外子公司而言,母公司无形资产对其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创新核心国与中国之间的知识交流比较密切,有助于形成较为通畅的开放式创新通道,促进投资过程的知识溢出效应,加速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的转移。此外,与非核心国相比,创新核心国的创新体系更完善,自身创新能力更强,有助于发挥母公司的技术、品牌、声誉等无形资产在海外子公司的推广,提高海外子公司的市场认可度,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提升海外子公司绩效。

2. 东道国数字技术水平的差异

互联网、5G、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加速革新,使跨国企业出现数字化新趋势,其国际投资路径、国际化模式和区位选择因素发生了深刻变化

^①为了论述方便,本文指的东道国包含国家和地区。涉及相关概念,如核心国家、非核心国家,均包含国家和地区。

(詹晓宁和欧阳永福, 2018)。数字技术发展对国际投资流动的影响越发重要(张昆贤等, 2022)。由于中国海外投资分布广泛, 不同东道国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胡浩等, 2017)。东道国数字技术发展, 加速信息传递, 有利于知识跨境流动和技术溢出效应以及逆向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和充分释放。那么, 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可能因投资东道国数字技术水平的不同而不同。为此, 本文采用蒋殿春和唐浩丹(2021)的做法, 根据东道国 ICT 服务^①出口占总服务出口的比重, 来衡量东道国的数字技术服务资源及数字技术对外合作程度, 并以中位数为界, 将样本分为东道国数字技术水平高和数字技术水平低两个子样本, 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5 所示。

表 5 列(3)为东道国数字技术水平高的国家, *Intangibles* 的系数为 0.955,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列(4)为东道国数字技术水平低的国家, *Intangibles* 的系数为-0.620, 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东道国的数字技术资源越丰富, 数字技术水平越高, 越有助于发挥母公司无形资产在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 一方面, 数字技术加快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技术知识等无形资产的传递速度。东道国数字技术发展, 有助于打破时空限制, 提升子公司存储、传输和共享信息和知识的能力, 降低母子公司之间的沟通协调成本, 增强跨国公司内部学习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效应(Fang 等, 2016)。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增强海外子公司的技术吸收能力。子公司要想获得跨国企业母公司关于专利、品牌、营销新模式等无形资产专有知识, 必须提高自身的技术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 而跨国信息交流效率与频率(Casella 和 Formenti, 2019)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海外子公司可以借助东道国数字技术开发的数字知识库, 来增强自身吸收能力, 通过高效地学习母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 及时调整运营模式, 改善绩效表现。

表 5 异质性分析

项目	(1)	(2)	(3)	(4)
	创新核心国	创新非核心国	数字技术水平高	数字技术水平低
<i>Intangibles</i>	0.603 * (0.335)	0.285 (0.367)	0.955 *** (0.289)	-0.620 * (0.36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398.338 (371.648)	-86.150 (84.530)	-110.017 (96.369)	40.465 (127.720)
观测值	1 751	2 551	3 002	1 215
R ²	0.319	0.318	0.279	0.426

①ICT 服务包含计算机和通信服务(如电信、邮政和快递服务)以及计算机数据相关的信息服务等。

四、进一步分析

前文考察了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指出母公司无形资产主要通过增强企业技术创新优势,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那么,这种影响机制是否成立呢?本文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增强技术创新优势

技术创新优势是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存续并与当地企业进行持续竞争的重要基础。具有无形资产优势的母公司有能力将自身优势资源转移到海外子公司,为其发展奠定资源基础(柴宇曦等,2021)。海外子公司通过吸收母公司转移的优势资源,并结合东道国当地的新技术知识,不断提高创新效率和质量,进而形成技术创新优势,使自身在和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并逐步扩大海外市场盈利和规模。Lee等(2014)、王碧珺和衷子雅(2021)研究表明,海外子公司的技术研发资源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影响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关键因素。基于此,为了验证母公司无形资产是否会通过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优势进而影响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本文使用企业研发费用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技术创新优势(*Innovation*),然后实证检验母公司无形资产对企业技术创新优势的影响,结果见表6列(1)。可以看出,*Intangibles*的系数为0.141,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母公司无形资产能有效增强海外子公司的技术创新优势,为提升其经营绩效奠定创新基础。

(二)缓解融资约束

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是一项长期而持续的过程,伴随着信息不对称、竞争对手、文化差异、外来者劣势等投资风险,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母公司拥有的品牌、商誉等营销型无形资产,不仅有助于提升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消费者和合作伙伴中的品牌认可度和信任度,还可以通过品牌与信息传递效应(苑泽明等,2023),帮助海外子公司获取当地政府和银行等机构更多的关注和投(融)资支持,缓解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面临的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海外扩张和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Hoskisson等,2013; Todo, 2011),企业获得资本的能力越强,越有助于促进其国际化进程(Peng和Su, 2014)。为了检验母公司无形资产是否会通过影响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本文参考石丽静和洪俊杰(2019)的做法,使用企业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差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Finance*)。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低。表6列(2)汇报了母公司无形资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Finance*的系数为0.006,在5%的水平上显著。*Finance*指标数值越大,反映的是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低,其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母公司无形资产能有效缓解海外子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为经营绩效的提升奠定融资支撑。

表 6 影响机制回归结果

项目	(1)	(2)
	<i>Innovation</i>	<i>Finance</i>
<i>Intangibles</i>	0. 141 *** (0. 033)	0. 006 ** (0. 002)
控制变量	是	是
行业/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常数项	-9. 879 (7. 359)	-3. 029 *** (0. 813)
观测值	2 811	6 404
R ²	0. 591	0. 576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在此背景下，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使双向投资协调发展。无形资产作为技术创新的载体，体现了知识从量到质的升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重要的隐性资源，对于培育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创造价值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无形资产为中国跨国公司提高海外投资的经营绩效提供了新思路。本文采用 2010—2022 年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考察了母国和东道国的技术距离和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基于东道国在全球创新体系的层级和东道国的数字技术资源的差异，考察了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进一步讨论了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

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母公司无形资产的增加有助于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第二，母国和东道国的技术距离，对母公司无形资产和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当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低于中国时，母国和东道国的技术距离扩大会降低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当东道国的技术水平高于中国时，母国和东道国的技术绝对距离扩大会增强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第三，母国和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会抑制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即母国和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越大，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弱。第四，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东道国属于创新核心国和数字技术水平高的国家中更为明显。第五，母公司无形资产主要通过增强企业技术创

新优势,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本文研究结论不仅说明了无形资产对于提升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重要价值,还拓展了跨国公司内部联结关系的相关研究,为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推动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和参考。

首先,数字经济时代,跨国企业需要重点关注无形资产的赋能效应,高度重视无形资产的投资和培育,既要增加专利、技术等生产型无形资产的投入,提升产品质量和企业创新能力,又要注重培育品牌、商标等营销型无形资产,拓宽销售渠道,强化消费者忠诚度,增强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制定重点领域的优惠政策,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效应,积极引导和增强中国跨国企业培育无形资产的意愿和能力,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助力中国跨国企业实现高质量“走出去”。

其次,中国跨国企业在利用无形资产赋能海外子公司绩效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中国和东道国的技术距离和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当中国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专利、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的赋能效应,应优先选择到技术水平高于中国的东道国开展投资活动以提高海外投资收益。另外,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还应优先选择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差异更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政府及相关部门,一方面需持续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努力缩小与技术能力水平高的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另一方面,还应积极为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多关于东道国的技术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风险方面的相关信息,并在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申请与维权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和便利化服务,进而帮助企业降低信息搜集成本、海外经营风险和外来者劣势,努力实现母公司和子公司间的价值共创,促进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提升。

最后,伴随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应重视考察东道国在全球创新体系的层级和数字技术资源水平。中国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设立海外子公司,如果想发挥母公司无形资产对海外子公司的赋能效应,应优先选择位于全球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国和数字技术资源丰富的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地。这有利于加快知识信息沟通并增强知识吸收能力,提高母公司无形资产等知识转移效果,扩大海外子公司的技术储备,提升海外投资经营绩效。

[参考文献]

- [1] 柴宇曦,张洪胜,马述忠.数字经济时代国际商务理论研究:新进展与新发现[J].国外社会科学,2021(1):85-103+159.
- [2] 陈涛涛.中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J].世界经济,2003(9):23-28.
- [3] 陈怡安.技术差距、技术进步效应与海归回流的知识溢出[J].经济管理,2014,36(11):154-165.
- [4] 傅帅雄,罗来军.技术差距促进国际贸易吗——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7(2):43-52.
- [5] 郜志雄.无形资产对工贸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J].经济问题,2024(3):85-91.

- [6]耿伟,吴雪洁,冯雅获.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J].国际经贸探索,2021,37(12):74-89.
- [7]胡川,王子豪.圈层结构视角下无形资产内在转化机制研究[J].科研管理,2024,45(1):153-161.
- [8]胡浩,金钊,谢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估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7(10):45-54+136.
- [9]蒋殿春,彭大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J].国际贸易问题,2023(10):36-52.
- [10]蒋殿春,唐浩丹.数字型跨国并购:特征及驱动力[J].财贸经济,2021,42(9):129-144.
- [11]欧忠辉,姜南,马艺闻.国别差异视角下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J].科研管理,2024,45(3):161-170.
- [12]沈国兵,黄铄珺.行业生产网络中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含量[J].世界经济,2019,42(9):76-100.
- [13]石丽静,洪俊杰.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9(11):146-158.
- [14]司月芳,梁新怡,曾刚,等.中国跨境知识溢出的地理格局及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20,40(8):1-8.
- [15]王碧琚,高恺琳.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40(8):111-130.
- [16]王碧琚,袁子雅.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绩效表现及其差异分析[J].经济管理,2021,43(1):72-88.
- [17]吴超鹏,唐菡.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6,51(11):125-139.
- [18]衣长军,余杰,申慧云.社会信任多样性、进入模式与海外子公司绩效[J].南开管理评论,2024(4):1-22.
- [19]衣长军,赵晓阳.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J].中国工业经济,2024(1):150-169.
- [20]衣长军,赵晓阳,黄嫒.高管海外背景、进入模式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2,42(8):88-100.
- [21]苑泽明,范琳,史方,等.无形资产实力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企业与区域层面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23(9):3-20.
- [22]于品显.后 BEPS 时代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新规则[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3,30(3):60-75.
- [23]余骁,黄先海,陈航宇.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距离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J].中国工业经济,2023(6):99-117.
- [24]詹晓宁,欧阳永福.数字经济下全球投资的新趋势与中国利用外资的新战略[J].管理世界,2018,34(3):78-86.
- [25]赵晓阳,衣长军.移民网络、母公司管理者能力与海外子公司绩效[J].世界经济研究,2024(3):34-46+135-136.
- [26]赵晓阳,衣长军,陈初昇.母公司数字化转型能提升海外子公司绩效吗——来自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24(4):141-156.
- [27]张杰,陈志远,吴书凤,等.对外技术引进与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J].经济研究,2020,55(7):92-105.
- [28]张昆贤,武常岐,陈晓蓉.数字经济时代跨国企业子公司角色变革研究——内部化理论分析框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42(11):3-18.
- [29]郑磊,吕美静.东道国特征对中国制造业企业 OFDI 区位选择和子公司绩效影响的研究——基于投资动机视角的实证检验[J].宏观经济研究,2022(1):55-73+101.

- [30] ARGOTE L, MIRON-SPEKTOR 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to Knowledg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1, 22(5): 1123-1137.
- [31] BERRY H, GUILLEN M, ZHOU N.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Cross-national Dist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41(9): 1460-1480.
- [32] BUCKLEY P J, CASSON M C. The Internalization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Review of the Progress of Research Agenda after 30 Yea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9, 40(9): 1563-1580.
- [33] CASELLA B, FORMENTI L. FDI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 Shift to Asset-light International Footprints[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2019, 25(1): 101-130.
- [34] CONTRACTOR F, YANG Y, GAUR A S. Firm-specific Intangible Assets and Subsidiary Profitabilit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istance, Ownership Strategy and Subsidiary Experience[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6: 950-964.
- [35] DELIOS A, BEAMISH P W. Survival and Profitability: The Roles of Experience and Intangible Assets in Foreign Subsidiary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5): 1028-1038.
- [36] DUNNING J 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173-190.
- [37] FANG E A, LI X, LU J.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n Process Technology and Operations Performance in Mass Customiz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6, 174(4): 68-75.
- [38] HOSKISSON R E, WRIGHT M, FILATOTCHEV I, et al. Emerging Multinationals from Mid-range Economies: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s and Factor Marke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3, 50(7): 1295-1321.
- [39] JENSEN R, SZULANSKI J G. Stickiness and the Adaptation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in Cross-border Knowledge Transfe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35(6): 508-523.
- [40] KONARA P, SHIRODKAR V. Regulatory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MNE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Climbing-up vs. Climbing-down the Institutional Ladder[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18, 24(4): 333-347.
- [41] LEE J Y, PARK Y R, CHAURI P N, et al. Innovative Knowledge Transfer Patterns of Group-affiliated Companies: The Effects on the Performance of Foreign Subsidia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14, 20(2): 107-123.
- [42] LUO Y, TUNG R L.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481-498.
- [43] NELSON R R, WINTER S G. Evolutionary Theorizing in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 16(2): 23-46.
- [44] NORDENSVARD J, ZHOU Y, ZHANG X. Innovation Core, Innovation Semi-periphery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Case of Wind Energy Patents[J]. *Energy Policy*, 2018, 120: 213-227.
- [45] PENG M W, SU W. Cross-listing and the Scope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4, 49(1): 42-50.
- [46] TODO Y.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of Export and FDI: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Japan[J]. *World Economy*, 2011, 34(3): 355-381.
- [47] UDDIN M R, HASAN M M, ABADI N. Do Intangible Assets Provide Corporate Resilience? New Evidence from Infectious Disease Pandemics[J]. *Economic Modelling*, 2022, 110: 105806.
- [48] ZHAO M. Conducting R&D in Countries with Weak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J]. *Management Science*, 2006, 52(8): 1185-1199.

Can Intangible Assets of Parent Compan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 A Du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echnological Distance and Differenc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HI Lijing¹, HONG Junjie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2.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ited the micro-economic data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22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tangible assets of parent companies o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distance and differenc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angible assets of the parent company can promote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When the technology level of the host country is lower than that of China, the technology distance expansion will reduce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intangible assets of the parent company o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When the technology level of the host countr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hina, the technology absolute distance expansion will enhance the effect of intangible assets of the parent company o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The differenc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between the home country and the host country will inhibi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parent company's intangible assets o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parent company's intangible assets on the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is more obvious in the sample of host countries which are innovation core countries and whose digital technology resources are abundant.

Keywords: Intangible Asset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Technical Dist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责任编辑 祝子白 刘建昌)